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三期 ——  
(二〇一四年八月四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8a)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三十二)	孙怒涛
【研究报告】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邓 鹏
【研究动态】	给中国历史上最大灾难时代永远存证	高伐林
【史海钩沉】	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杜钧福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三十二)

• 孙怒涛 •

(上接 zk1407c 第十章 回顾与反思)

### 第四节 拷问良知，每个国民和执政党都应认真做的功课

当 1966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篇社论的时候，我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无法想象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灵魂究竟是怎样一个触及法。经历了十年文革，人们才深深体会到了文革确实触及了灵魂，结果是有污染的灵魂，有出卖的灵魂，也有升华的灵魂，甚至连同肉体一起被消灭的灵魂。

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统统革了命。对灵魂和天理也是一场“革命”：真善美颠覆，道德沉沦，良知泯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被鄙视、被唾弃，不知耻、不知愧、不知恩的勾当大行其道。

当然，我们看到了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以生命为代价反抗文革的志士仁人。只是，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们也看到过那些帮助、搭救落难的、无助的好心人。只是，这样的行善好事只能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做，也不是经常都有。

我们倒是看到了太多的父子反目、夫妻成仇，太多的检举揭发、落井下石，太多的唱赞歌、表忠心，太多的整人与被整、人人自危和自保不暇。

乾坤颠倒了，人妖颠倒了，黑白也颠倒了。

我已经讲过，清华团四两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观点分歧和群体利益矛盾。作为个人而言，其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除了受政治观点、派别利益的影响外，还受道德和良知的驱动。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一种反人性的、反人伦的邪恶学说。当一个人坚奉这个革命理论、深受这一理论毒害的时候，那么他的良心就变黑变坏了。

在百日大武斗中有好多师生死亡伤残，他们是最惨重最无辜的受害者。其中尤以孙华栋、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钱萍华的冤死更令人无比痛惜！

没有参加武斗的孙华栋是在夜晚骑车经过一教被抓后活活打死的。朱玉生是深夜在科学馆外值班放哨时被闻亭上的暗哨开枪射杀的。杨志军是在科学馆内了望时被冷枪射杀的。杨树立是土坦克从动农馆返回焊接馆途中被二校门西南角小山包地堡里射出的冷枪射杀的。钱萍华是从苏州老家返校时在主楼广场被 9 0 0 3 大楼射过来的冷枪射杀的。

这几位死难者，在他们被打死或射杀之前，没有对包括凶手在内的任何人构成任何威胁，更别说是致命的、不得不采取本能防卫的威胁了。当这些凶手把一个健壮的大活人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当瞄准器里的十字星套住远方的目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无法想象这些凶手到底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抱着对伟大领袖无比的热爱，对阶级敌人无比的仇恨才这么下手的？他们就没想过这一鞭子打下去，这一颗子弹射出去，马上会要了一条鲜活的人命？

在犯下罪行的那一刻，他们的良知完全泯灭了，他们的道德完全沦丧了。

再说一件在百日武斗中的往事。5。3 0 大战中，防守东区浴室的人员是 4 1 4 电机系分部的，其中有我熟识的好几个朋友。他们当时是可以一直坚持到天黑的。但是为了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一名老四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得不向老团集体投降。我对他们的这一抉择表示由衷的敬意和钦佩！人性终于战胜了派性！我知道，在那个崇尚宁死不屈的年代，他们当时要作出这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他们事后被部分老四责怪，身心备受煎熬。几十年以后，他们的这一无畏而明智的举动受到大家的一致赞誉！历史，最终都会肯定真、善、美的！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补充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防守浴室的老四向老团集体投降成了俘虏以后，曾经遭到个别老团及外校人员的殴打。看到这一场景的许多老团公开表示气愤和谴责。武斗期间，有些老团听闻无辜射杀同学的事情后就不再参加武斗以示抗议。这些有良知的团派朋友，我同样给以称赞和敬意！

在 1 9 6 8 年的 7 月初，“蒯大富下令用枪封锁科学馆，凡有出入者，格杀勿论。”朱玉生、杨志军、杨树立三人都是在这之后被“格杀”的。我心想，如果蒯大富不是发布“格杀勿论”

这种大开杀戒的通令，而是发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射杀武斗人员，否则一切后果自负！”这样强硬的约束通令，我会说，这样的一纸通令将抵过蒯大富的千错万错而为后人翘指称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文革中两派争论激辩的那些所谓对立的观点，其实大前提都是错误的，不值得再提的。最值得记忆的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那一刻，最痛彻心扉的是丧尽天良的那一瞬。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文革中，几乎每个人都犯过或大或小的过错，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犯罪。犯罪的是极少数人。罪与错的最后分野不只是在法理上，更是在人性上，在良知上：你有没有为了表示“革命的义愤”而拿着皮鞭毒打老师、同学和干部？你有没有为了自保而诬陷他人？你有没有挺着尖尖的斜口长矛刺向对手的要害？你有没有举着带有瞄准器的步枪射出罪恶的子弹？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是突破了道德的最底线，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良知。即使你逃过了恢恢天网苟延残喘着，你一辈子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而永不安宁！

良知完全泯灭的，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得不承认，在文革这样的大环境中，或多或少，良知都蒙尘了。

我的良知也有蒙尘的时候。

在文革期间，我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犯过的错误不少。其中有一些错误，于我来说确实是无法避免的。譬如，批判刘少奇、批斗王光美、批判走资派，等等，当时的觉悟就这么一点，认识不到这是错的。还有出于派性利益那种上纲上线、攻击谩骂、说谎隐瞒等等，当然都是错误，也是有悖于良知的。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为了入党，为了今后前途的私利，明知不应该做，最后还是做了深感羞愧的错事。那一刻，我的良知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

做错过事以后，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拷问自己的良知，清算过往的错误，不断地在反省追悔。虽然我做得很初步，认识得也很肤浅，但是我是真诚的。我知道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于事无补，我只是想在我离世之前拂尘涤污，质本洁来还洁去。告知后人们，良心账是一定要加倍偿还的，有时候是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有人选择痛苦地反省，有人选择快乐地遗忘。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的权利和自由。在道德的层面上，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检讨自己的错误，拷问自己的良知。愿不愿意拷问，全取决于自己。愿意拷问的，即使很痛苦，也会发自内心的去做。

但是，我认为，每个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良知蒙尘的时候。所以，不论以什么形式什么方法，认真地扪心自问想一想，反思一下，拷问一下，可能是应该的，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我看过一些文革回忆录。有的写得很好，很有史料价值，也很有思想深度。但是也有一些回忆录，或者隐恶扬善（只讲自己好的、对的、被人整的，不讲自己错的、恶的、整别人的），或者推诿责任（都是因为跟着伟大领袖犯错误，受林彪、四人帮蒙蔽），或者有意无意地涂抹历史、美化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在身后留一个好名声。这样做，实在背离了回忆录的真义。

拷问良知，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做的功课。

为什么在强权和暴力面前我们往往忍气吞声以阿 Q 精神安慰自己而不敢据理抗争？为什么在面临危险受到威胁时我们总把伤害转嫁到更弱势的群体？为什么我们总是心里想的与嘴上说的不一致表那种言不由衷的态？为什么人人都气愤社会的道德滑坡而真当该出手该出面的时候

却做了缩头乌龟？……

拷问的主要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

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在某一时刻良知蒙尘，可能是很难免的。这并不可怕。因为还有机会补救，还有能力拂去灰尘，重现人性的光辉。所以，一个伟大的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心智健全高素质的国民，并非是绝对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在反思后避免再犯同类的错误。

拷问良知，更是执政党必须认真做的功课。

为什么曾经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在执政以后却视民主宪政为洪水猛兽？为什么过去鼓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反饥饿反内战而现在却站在青年学生的对面向反官倒反贪腐的他们开枪？为什么不敢公布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真相不敢承认反右就是反错了而不是令世人嗤笑的“扩大化”问题？为什么要把一党私利置于国家民众之上并把全社会的资源攫为己有？……

拷问的目的，是成为一个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政党。

建党九十多年来，建国六十多年来，只讲光荣伟大正确，只讲莺歌燕舞，不检讨所犯的重大错误，不向被伤害的国民谢罪。从建国以来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帅，到后三十年的拜金主义，导致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失守，这样严重的恶果与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丧失是有密切关联的。

为什么会造成社会道德的滑坡和良知的缺损？我认为多年来一贯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很重要的原因。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如一张白纸。知识、道德、品行、良知等等，都是后天培育积淀的。家庭、环境、教育，都是重要的环节。就我的体会，对我的品行、操守、人格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是纯朴的乡风民俗的濡染，是小学和初中这段政治内容不多的心智启蒙教育。后来从高中到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阶级教育、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教育、党史教育以及形式繁多的运动、活动这类德育教育，不能说全部都是垃圾，也是无益甚至有害的居多。

执政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就是把学校当做它属下的一个衙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就是把教育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把教育视作它的私产和统治工具。所谓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其实就是培养一批听话出活的良民、顺民。而国民教育要培养的是具有善良、正直、友爱、正义、诚实、勇敢、信义、守法、孝心、知耻、独立思考这些最基本的品德和精神的现代公民。在学校里，进行无休止的“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灌输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思想等正统思想。以政治辅导员制度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教育、灌输、监督、控制，清除异己思想，排查异己分子。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所培养的青年学生必然是心智不全的、只听命于领袖和政党的文革炮灰。

权力不受有效制约和监督的一党极权体制，必然导致贪腐丛生，导致社会不公，也导致政治伦理的丧失。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是造成社会道德滑坡和良知缺损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现今社会的痼疾多多。中国的进步不仅需要包括教育体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公民责任意识，需要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然而，一党极权的体制却在不断地在继续强化灌输党文化，不断地抑制公民意识的觉醒，不断地在摧毁人性道德价值观念。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解决社会痼疾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是，要是不切实

进行积极有效的、渐进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想解决种种社会痼疾是万万不能的！

2007年8月2日 动笔  
2011年12月30日 完成征求意见稿  
2013年1月24日 终稿 于杭州

〔全书选载完〕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研究报告】

## 文革初期的大民主：一个概念的名与实

• 邓 鹏 •

—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篇论及革命的文章（《革命的得与失》）中，提到过对革命概念的一种理解。当时写到，革命是一种改变或调整，改革也是一种改变或调整，但革命与改革相对立。改革是指限制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的一系列变化和调整，革命则是指国家范围内整个政治或经济制度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常见的变化可以发生在政治领域，可以发生在经济领域，还可以同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发生在政治领域的革命是政治革命，发生在纯经济领域的革命是经济革命，两个领域同时发生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因此，观察一次社会变化是不是场革命，主要是观察这一社会变化是否造成了政治或（和）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化。例如，在政治领域里，一场旨在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体的群众性起义固然是一场革命，封建君主出于某种考虑被迫向人民作出实质让步转而实施君主立宪的变化过程，其实也是一种革命。相反，一个政党在维持权力垄断的前提下对其统治方式进行种种调整的尝试只能称其为改革。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曾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整个中国，其影响甚至一度扩散到世界的许多角落，然而文革进程又以其血腥残酷，付出了难以计量的人员损失而著称，最后文革以无可争辩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这场被其发起者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吗？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性质之前，首先需要对文革之前（1949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性质作一简略的判断。众所周知，1949年通过共产党武装革命建立的新中国，逐步施行了一套类似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如美国左翼学者大卫·科茨所言，理解这一制度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混合的制度，它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但也有许多非社会主义的因素。

“国家社会主义”一词，也许最能把握其精髓，因为国家的角色和本质，代表了最重要的非社会主义特征。这一社会制度最明显的非社会主义特征，是少数党—国精英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在五六十年的某些岁月（如1957年以前和1962年至1965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斯大林统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切实采取过一些的措施，旨在缓和官僚与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即便这种相对温和的政治制度，也是同样是专制的，因为它无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人民群众没有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更谈不上透过民主的程序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了。对纯粹理想的社会主义者而言，党国体制有着部分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尽管是经济权力也同样集中在官僚精英阶层手中。至于其非社会主义的方面，一切与官僚精英的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联系的方面——

它对自由、民主价值的敌视、它对人民权利的敌视、它对剩余产品的支配则是极端反动的。不难理解，以官僚统治为对象的革命首先要求是一场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将争取基本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争取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继而巩固与革新政治相配套的经济结构。所以，文革之于革命，关键在于文革能否及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前述意义上的政治革命？问题之解答，则主要取决于文革运动的号召者和参与者究竟提出了哪些具有自由、民主价值的政治要求和目标？在整个文革进程中，人们又是如何围绕这些政治要求和目标开展活动的？

## 二

毛泽东曾在1967年5月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从姚文元同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二月提纲、发出《5·16通知》的这一准备阶段，严格地说只是新一轮党内路线斗争的展开，阅遍当时的报社评论和正式发布的中央文件，几乎找不到有利于自由、民主和政治平等价值的表述。《5·16通知》谴责了“二月提纲”在“放手让其（牛鬼蛇神）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的同时，却以“所谓‘有领导’、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为由，“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但批评的目的却是企图“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毛泽东为此还特别加入了一段话，批评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强调“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全国部分学校的红卫兵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以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大字报，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就提出了如何对待人民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问题。6月1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以此表示对学生张贴大字报权利的支持，而刘邓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当时毛在杭州）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随着批评学校党委（及稍后派驻的工作组）的大字报急剧增多，各大中学校及党政领导机关的党委全力进行压制，一方面是操纵群众揪斗（内定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另一方面又普遍把揭发党委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据统计，仅北京部分（二十四所）高等院校里，工作组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有的人甚至因此受迫害致死。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演变下去，极有可能成为类似57年那样的新的反右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7月20日表达了对工作组的不满，还声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四天后，他又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在毛的压力下，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8月份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的真正发动。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到，“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他又盛赞“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还说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稍后，毛泽东甚至还公开发表了自己所写的一份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十六条》）。事实上，在中央高层，并非是毛泽东一人在推动转变，他的身旁还围绕着林彪、周恩来等官僚支持者及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小组的成员多数为毛泽东主义的笔杆子，组长陈伯达尽管以刘盆子自况，但他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在6、7月，陈伯达就对派驻工作组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在中央属于少数派。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的政

治地位明显上升，并成为《十六条》的起草者。《十六条》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从而在官方文件上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十六条》还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十六条》特别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据陈伯达晚年回忆，“我写这一条，是想用选举领导人员的办法来改革过去单纯依靠上级任命的做法。毛主席那时候也同意我的这些意见。但是后来这一条没有能具体实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学生们开始利用《十六条》中有利于他们的条款进行活动，自发成立了各类造反团体和组织，继而走向社会，开展横向和纵向的串联活动，运动的规模明显增大了。例如，10月1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布的第三号通令中声称：“有些革委会是工作队一手泡制的，没有经过群众全面选举。它的产生就违反了十六条。……凡是在工作队一手操纵下组织的革委会、筹委会等组织要立即解散，新的革委会必须由群众按巴黎公社选举制民主产生。”作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方针的努力，也是作为针对部分地方权力者压制和破坏学生运动的约束，中央也连续下发多份文件，包括8月21日“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等。后来又有10月5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内称：“凡是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分子’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查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整群众的材料要当众销毁。”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要求：“按规定处理材料问题。即全部集中，当众焚毁。”以至于总理周恩来在10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现在的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

文化革命一开展的时候，重点是放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大中学校，还有党政领导机关，而工厂、农村的文革运动则受到了限制，这个限制既来自中央，也来自地方权力机关，现在日益广泛的社会运动正试图冲击和突破限制它们的条条框框。上海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11月9日，由上海玻璃机械厂，国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147服装社等工人造反派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造反派联盟，“工总司”是上海工人自己创立的，没有依赖北京的指示。“工总司”成立后，立即公布了他们的五条要求，其中第一条是要求官方承认该组织是合法的，这就向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了挑战。当“工总司”的要求被地方党委拒绝以后，激进的工人于次日强行占用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希望见到毛泽东以实现他们的目的。火车被迫滞留上海市郊的小镇安亭，部分工人无视返回城里的命令，停留在那里并僵持了5天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初期，陆续涌现过许多新的群众组织，象最早成立的中学红卫兵组织，稍后崭露头角的大专院校造反派学生组织，抑或是晚近发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等等，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阴谋家，强行施加在群众头上的，而是群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发创造出来的，且往往有一个通过斗争取得承认的过程，毛泽东主义的中央通常只是在顺应运动发展的形势，或主动或被动的放开口子，如毛泽东所言：“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造反派这个事实，然后才有组织的概念，就是说要承认它是合法的。安亭事件以及其它地方的类似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不得不认真考虑工人以及农民参加文革运动和自由结社的权利，其结果是12月9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12月15日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下发，工矿十条不仅允诺了：“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还允许进行横跨工厂和学校的串联，实际上意味着在地方上建立囊括学生、工人与职员等在内的大规模跨行业群众联合政派的时机逐渐成

熟。

### 三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月4日,上海“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次日毛泽东即对夺权问题做出批示。1月5日,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组织,在该市的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第二天,即1月6日,据称有上百万市民聚集在人民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市长曹获秋和党的其他高级官员遭到批斗,被撤了职,旧市委垮台了。这是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开始。毛泽东高度评价上海一月革命,并认为“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讨论各地兴起的“接管风”,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夺权。会后《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号召全面夺权。夺权,成为一月革命风暴的中心词汇。

夺权,颇有含糊性的一个概念,非政治学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使用,流露出文革运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和随意性。夺权,也就是夺取权力,夺权政权,但并不一定会改变政权的结构,因而夺权的概念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场政治革命。回到历史的现场,夺权也的确带来了无法解决的一个悖论,文革运动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文革运动的指向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义的中央自然不在其列,毛泽东设想的夺权可以是夺取地方上党政机关的权力,甚至是夺取基层单位的权力(毛本人也没有预料到后者),但绝不会是夺取中央的权力。人们不得不提出疑问,地方上夺权的合法性来源于何处?究竟该由人民还是毛中央来授权与承认?在当时,不仅地方上摇摇欲坠的官僚对群众组织的夺权普遍持抵制态度,即便是毛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如1月15日陈伯达在北京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批评了各地的接管风,主张“一般不用接管的办法”,而是“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但毛泽东认为接管难以避免,因而没有接受陈伯达的观点。凭心而论,当时人民群众已获得了“四大自由”、建立群众组织及发行群众报刊的权利,在中共建政以来的近二十年里还是头一回,成就已是斐然,如能进一步完善群众组织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不失为稳中求进,逐步扩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步骤。但也须懂得,尊重群众组织的权利,就需要尊重群众组织表达政见的权利,既然如此,要不要夺权,如何夺权,就应该经由人民群众自主的选择。人民固然有犯错误的时候,但他们拥有因认识不足而犯错误的权利,同时他们需对自己的错误承担相应的责任,最后他们也拥有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在革命的一月,上海,还有其它省市的夺权浪潮从最底层掀起,不少工厂及其它基层单位实行了基本公正的无记名投票选举,这在迄今为止中共执政六十多年的时间内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便在世界民主革命史上这种现象也难得一见。

权力总是与秩序密切相连。当地方上的夺权渐入高潮之际,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稳固秩序,以确保夺权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下去。较早的措施之一是1月11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制止群众组织中“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文革极为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群众建立属于自己的组织并以组织化的形式来参加运动,然而群众并不是一个联结起来的统一整体,不同的群体可能拥有各自不同,往往还是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现在这些特殊利益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合同工、临时工群体要求获得更多的工资与福利,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工作等。权力者本来有权决定是否采纳不同群众组织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但现在他们开启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先例——中央权力试图根据自身的意愿来限制和剥夺群众组织提出某方面要求的权利,这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也许会随心所欲地再次剥夺群众组织存在的权利。



两天后，即1月13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则对群众及其组织施加了严厉的约束。“公安六条”明确规定“地、富、反、坏、右”等分子，“一律不准外出串连，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从而剥夺了政治“不合格”者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如果说，这样的规定旨在营造阶级民主的条件，那么“公安六条”同时又有群众（即便是政治合格者）不得“利用大民主”，来“散布反动言论”的约束性规定，至于第二条“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的规定更是荒谬无比，极易利用来镇压那些不怎么听话的人。“公安六条”通过以后，第一个被镇压的组织是高干子弟云集的联动，此前联动在北京公开“炮打”中央文革并数次冲击公安部，现在（1月20日前后）公安部门前往学校抓捕了该组织的部分成员。

1月14日中共中央还下发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其中规定“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自文革开展以来，军队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对运动则一直奉行不介入的方针。不同于地方上的旧党委、政府，军队并不掌握行政和司法权力，不属于夺权斗争的范围，因此禁止群众组织冲击军队机关的规定还是很有必要。

除了颁布政令，中央首长在一些公开谈话的场合也频频表态，意在约束和规范群众组织的行为。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群众的谈话中声称，“（群众）应该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按系统，按工作岗位组织起来。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1月21日，周恩来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早在1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已从北京返回上海，为此莫里斯·迈斯纳评论“旧市委垮台了。然而取代旧市委的并不是进行‘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张春桥。1月6日，张春桥又来到上海，他不但把自己置于获胜的群众运动的首位，而且控制了群众运动，要重新建立城市的秩序。”张春桥在获得上海最大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工总司”支持的同时，也竭尽全力争取当地军方及地方干部的支持，由于有毛的直接支持，上海很快的恢复了秩序并着手创建新的权力机构。

毛泽东的中央虽然批准了上海的夺权，并号召各地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夺权，却没有很快就夺权以后的权力架构作出明确的指示。毛或其他人似乎仍需要一些时间用来思考，从而造成了一月中下旬一段难得的空白，也是文革中最富有想象力的时日。1月22日，陈伯达在对北京部分学生的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以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的形式来进行全国性的夺权，”“还有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应该是人民内部来承认，应是人民授权去夺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才能有效。”他还介绍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进城的时候，是军事接管，自上而下地下命令。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阶段，是群众接管了。”

此时的上海，各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据徐景贤回忆，张春桥等人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几个主要的组织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上百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它的诞生。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声明“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它的领导

成员，在上海自下而上的全面大夺权取得胜利后，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在目前，则由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组成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机构，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公社临委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其权力的合法性不是产生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中央。尽管如此，公社宣言关于组织原则的表述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社的观念和理想已经在人民中扎下了根。

#### 四

1967年1月下旬，毛泽东对全国夺权斗争做出了新的也是充满矛盾的重大部署。1月22日毛泽东做出了“（地方）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发布，其中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文件下发后，过去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军队究竟要如何介入文革如何支持左派？军队在新的权力架构中又是处于何种地位和角色？甫一开始，人们还不是很清楚，但随着时日的发展，脉络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几天后，也就是1月28日毛泽东批发了以落实支左决定为意图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措辞更为严厉，其中要求：“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军委八条赋予军方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谁是右派，谁又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却是由军方自己来定性。军队系统拥有强大的武力，素来也只服从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指挥，它与群众组织之间本已处于力量极不平衡的状态，现在又拥有了军委八条的授权，因而军方在事实上取得了对任何群众组织采取专政措施的权力。

大概在1月底或2月初，中央开始有了“三结合”的正式提法。一月革命中，省一级的夺权经中央批准同意的只有五个，分别是上海、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据说这些地方的夺权满足了中央关于大联合、三结合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中央权力的认可。虽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一月底还在说：“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的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主张建立人民公社。”但类似的声音能否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想法和意图则要打上一个问号。已夺权的五个省市中，山西、贵州、山东、黑龙江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革命委员会，上海是人民公社。假使人们忽略这些机构的名，而穷究其内在的实，那么这些机构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均为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都经过中央权力批准，其领导成员非经选举产生等等。同时它们之间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有的地方机构（如山西、贵州、山东等）里军队和（或）地方党政干部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有的地方（黑龙江）最初却任命了群众组织负责人为机构的第一把手，上海公社则明确承认其权力的临时性质，以后需“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

2月5日上海公社成立后，据徐景贤回忆，（上海）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一时社会上流言四起，张、姚也坐不住了，只好亲自到北京汇报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就笔者手头的资料，上海公社成立一事的确在中央引发了严重的争论，2月11日下午中央碰头会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斥责上海：“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还说：“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

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毛泽东没有反感叶的说法，反而认为：“你（叶）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张、姚2月12日抵达北京，大约呆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里毛泽东多次接见他们，并谈及关于文革、夺权、上海公社等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张春桥回上海后的一次谈话大量转引了毛泽东的原话和论点，这在文革原始资料中是非常罕见的，带有方针性质的，值得大段的引述。

毛泽东首先谈到文化革命的性质，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怎么要革命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接着他谈到夺权：夺权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成为中心的是三结合问题，这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以后能不能巩固的关键。要实行大联合，关键还在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三结合，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够算大联合。张春桥此时补充了自己的话，他说：“这条路（指小团体夺权）是不能走的，这是南斯拉夫的办法！有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应该说，毛的这一段讲话还是有其合理的部分，特别其中关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怀疑一切”和“打倒一切”，在革命中注重维持秩序和恢复权威的观点，关于“我们要相信大多数，相信95%以上的群众，相信95%以上的干部”的表述，关于夺权总得有领导，总得有干部的观点等等，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

接下来，开始谈起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说：巴黎公社是1871年成立的，96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依我看，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农兵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所以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东西都是形式，这个问题主要看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毛继续说：现在出了一个问题是想大家都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学上海，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没有这样去想，如果这样地想下去，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毛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毛甚至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毛泽东的这番话实在不可小瞧，其实质上是论及到了这场文革运动在政治革命意义上的根本目标和方向，因而带有全局性、总体性的意义。当毛泽东将政体看作纯形式，而将阶级统治（即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看作内容时，他忘记了一点，所谓的阶级统治问题在1949年的武装革命和其后的公有化浪潮中已基本解决了，他也没有弄清，这次文革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要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体。即便是资产阶级统治，也有民主制和集权制（如君主制、军人专政、法西斯统治等）的区别。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有官僚的社会主义，也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毛过去也屡次论及执政党内特权阶级的产生及其危害，因此命名为公社、革命委员会或许是个名义，但政体本身绝不仅仅是形式，是名义，政体也是政治领域内的实质，它涉及到权力来源的问题，是来自人民，经由人民以某种方式（如投票）授权，还是来自权力本身？毛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回避了，让步了，退却了，他只说到要有一个核心的党，却没有为民主说话，没有提到这个党的领导地位需要从一个更民主的制度中产生，“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一句话就轻易抹去了一月革命中亿万群众关于民主的政治想象。毛泽东既鼓动、允许了群众的造反运动，同时也给运动上一个紧箍咒，试图限制运动的范围和

后果。“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政治实践在触及到1967年一月革命的高潮后，在最高权力的规制下开始出现明显的低落，另一方面，群众组织一旦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就会依照自身的逻辑和意志行事，文革这艘的巨轮或仍为多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提供着广阔的场域。

## 五

公社的命运是在北京决定的，张、姚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命名，2月24日，上海公社正式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月夺权中的另一奇葩是黑龙江，1月31日黑龙江夺权后的权力机构全称为“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据范正美回忆，该省革命委员会最初的成员由三十余个群众组织组成的联合总部所推举，勤务组共五人，时任哈师院造反团负责人的范正美被任命为勤务组组长，另两名群众组织负责人任副组长，党政高干潘复生、代表军方的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任成员。应该说，黑龙江模式是一种有利于发挥群众组织影响力的“三结合”权力架构模式，但这种模式似乎也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3月16日中央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会见来自黑龙江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提议让潘复生、汪家道任省革委主任、副主任。中央的意图很快就实现了。

一月下旬军队奉命支左后，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实行军事管制。截至一月底，军管的情况仍然少见，只有全国的电台、民用航空系统等部门按规定施行了军管，但其后实施范围急剧扩大。1967年3月13日，总理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概括。他说，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中，除了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省市外，“已经实行军事管制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军事管制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派出军代表，必要时可以派出军队保护。周恩来还介绍说，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一般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全面领导所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特别要作好支持左派的工作，另一个班子，全面抓生产指挥工作，这个班子叫生产指挥部。周恩来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各级领导机构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

从周恩来的谈话中，可以明确几点：一是军事管制的临时性。军管会是临时机构，在大联合、三结合的条件成熟后将由革委会取代。二是军事管制的广泛性，连最普通的企事业单位也开始实施军管。三是军管会的权威性。军管会为当地最高领导机构，代行地方政治、行政和治安职权。四、军管会成员由军事机关派员组成。即便名义上“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应以军方为主导。周恩来在谈话中还引用了毛的说法：“从上到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和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在同一日李富春的讲话中，也有引用毛的最新指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3月19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看来自军队支左以来，中央的意图已逐渐明晰，2、3月份，正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军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从前难以想象的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即便其间北京发生了所谓的“二月逆流”的波折，也没有能影响到这一进程的开展。

如前节所述，恢复秩序和军队支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整顿群众组织，镇压藏身其中的反革命组织和成员。1月24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的会议上称：“最近有些反动组织，我们已宣布的，

像中国工农红军，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等都是靠解放军去破获。”2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并于2月24日由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出面捕人。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均为全国性组织，大小不等，此类组织的存在被视为对中央权力构成了挑战，因而招致取缔。2月17日，叶剑英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随后成都军区抓了数万人。地方上的镇压规模大得多，各地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有湖南的“湘江风雷”、武汉的“工总”、成都的“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广州的“八一战斗兵团”、福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委会”、“红九·二”等，基本上各省区都有，这里只能列举比较有名的例子。对“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其具体惩处方式是取缔组织，逮捕头头，一般成员亦须登记和写检查。个别地方，还因此发生了大量人员伤亡的事件，如新疆石河子1·2·6惨案、青海2·2·3惨案等，不再详述。当然，还有很多名义上合法的群众组织，特别是学生组织，但现在要求在内部开展整风，整掉所谓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不允许再搞上街游行或宣传车上街。3月7日，毛泽东批语：“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军训。”3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由于各地最激进也最难驯服的组织被连根拔除，其它各色群众组织在风声鹤唳、日益逼仄的政治环境中也逐渐停止活动甚至濒于解体。随着地方权力和秩序的重塑，群众组织的纷纷瓦解，到1967年3月中旬，文革运动在全国范围陷入低潮，颇给人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之感。

注释：

- 1、大卫·科茨、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2、《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7年编印的大事记》
- 3、陈晓农编，《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290页，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 4、莫里斯·迈斯纳，《上海公社始末》，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www.difangwenge.org/>
- 5、徐景贤，《徐景贤回忆录》，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www.difangwenge.org/>
- 6、1月31日，王力谈《红旗》第三期社论精神。引自：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com/>
- 7、徐景贤，《徐景贤回忆录》，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www.difangwenge.org/>
- 8、1967年2月24日，上海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姚文元张春桥在会上的讲话。引自：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com/>
- 9、范正美，《秋梦追思》，第三章弄潮峰巅，地方文革史交流网，<http://www.difangwenge.org/>
- 10、1967年3月13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引自：水陆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com/>
- 11、被取缔的组织有九个：“全国红色造反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农林战士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造反团”、“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部”、“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一线第一战斗队”、“全国兴无灭资军造反团总部。”

□ 摘自《共识网》

~~~~~

【研究动态】

## 给中国历史上最大灾难时代永远存证

• 高伐林 •

2006年5月12日，在纽约举行的有相当规模的“文革”40周年研讨会，有来自北美、欧洲、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几十位学者与会。以21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主任的身分来筹备和主持会议的宋永毅致开幕词，他说：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包括笔者在内的与会者一愣，然后哄堂大笑。

众所周知，中共执政者长期以来将关于“文革”的话题列为禁区，对调查研究百般压制，宋永毅竟然将中共列为“第一个”感恩戴德的对象？！

但是，宋永毅并不是说反话。

◇ 中共让他成了“名牌”

在那之前，宋永毅和美国一批华人学者，已经于2002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列为“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一；在那之后，2010年，又出版了之二：《反右运动数据库》，2013年，又出版了之三：《中国大跃进一大饥荒数据库》。

八年之后的2014年3月，笔者在费城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上，再次见到宋永毅教授。他告诉我，2014年年底，将出版“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之四，也是最后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最后这个数据库，是关于‘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一直到1956、1957年的‘肃反’的资料，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服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

在交谈中，宋永毅再次提到感谢中共。

为什么感谢中共？老宋大笑起来：“因为他们把我抓起来，极大地提高了我投身的文革研究事业的知名度和公信力。现在我走到哪儿，一说‘宋永毅’，就有品牌效应呀！”

笔者记忆犹新：1999年宋永毅回中国大陆被警方拘押，是在海外相当轰动的一件事。

当时在美国宾州迪金森学院图书馆工作的宋永毅，回中国收集“文革”资料而被捕。当局给宋永毅安上的罪名，是非法获取“国家机密文件”和“不准出境的文件”。但据《纽约时报》报导，其实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报刊，而且，并非来自机要部门和档案部门，而是来自民间——从类似北京潘家园那样的旧货市场上淘到，或者从私人收藏者手里搜集的。何罪之有？！

宋永毅认为：抓他是“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蓄谋已久的阴谋”，最主要是为阻止《文革数据库》的出版。“在我回国之前的1998年，从蒋经国基金会申请到一笔约3万多美金的基金，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准备做《文革数据库》。”

“当时有人举报说，这个项目是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审讯我的人，盯住蒋经国基金会，盯住我们这个数据库不放。想把我关个五年，这项目就做不成了。”宋永毅告诉他们：“中央情报局不要说对几十年前的事没有兴趣，对一个月以前的事可能就没兴趣了！”

关了半年，将他放了。宋永毅分析释放的原因说，主要是国际上的援救：美国和西方主流

媒体大量报道；101位美国、欧洲知名学者、教授联名写信给中国政府，要求确保学术研究的自由，其中许多是西方著名汉学家，有些还是一直比较倾向于中国政府的。海内外的反应，使得中国当局相当被动。当时中共需要美国给它最惠国待遇，扣住这样一个搜集“文革”红卫兵报刊的图书馆员不放，会让美国国会对中国印象恶劣而不肯松口，实在不上算。

宋永毅在回答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还披露：他的获释，也和中共党内有人对“文革”看法与公安、国安“鹰派”不一样有关。他说：“有一句讲一句：江泽民本身不一定同意国家安全部的观点。美国国会代表团当著江泽民的面，讲到这样一个无辜的教师研究‘文革’被他们抓起来，江泽民当场就表示：‘如果他就是因为研究文革，收集那些文革小报材料被抓，那是不对的。当然他如果有其它事，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当场跟他们讲了‘文革要研究’，讲自己怎么在‘文革’中间被批斗啊，坐‘喷气式’啊……哪怕是江泽民这样的人，都不一定同意那些‘死硬派’、‘毛派’的观点，抓我的完全是毛派。”

#### ◇ 被拘押反使研究突飞猛进

宋永毅的感谢，就是缘于这个理由：这次被拘押，反而使得他的研究突飞猛进。

第一，通过那么多媒体的报导，大家知道这个人要把一生献给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而且就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在揭示侵犯人权的祸害、整个民族、人类大灾难中被抓，引起公愤；

第二，对他回到美国以后申请研究基金和得到各方援助、收集资料等等，太有帮助了。宋永毅举过一个例子：自由亚洲电台当时也报导了他被捕，后来自由亚洲电台给他转去好多份非常珍贵的中共中央文件。怎么来的？是中国天津一位中学教师收听了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得知宋永毅正在做这个研究，就复印了那些当年的中央文件，寄到自由亚洲电台在东京的一个邮箱，转到了他手里。

宋永毅说：“更不用说我出来以后决定要继续编完那115本《新编红卫兵资料》。我到日本去，日本学者知道我是宋永毅，就相信我，愿意把他们10多箱红卫兵小报拿出来，说‘给你挑，你要就带回到美国’。当然我也送了他们不少东西——学术资料都是交换。”

宋永毅将这些资料扫描完了，归还给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收藏家。“搞到的所有小报，我不收藏，（扫描之后）全部送给他们。这样欧美学者也都愿意把手里的资料无偿提供给我。”

宋永毅还说，向美国的基金会申请钱得有人写推荐信，“都是麦克法夸尔等很有名的汉学家给我们写，因为他们知道了我这个人。这用老毛的话说，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为我的文革史和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 ◇ “文革”中坐了五年牢

从宋永毅1997年著手“中国当代史数据库”算起，至今已经17年；如果追溯他的“文革”史料收集和研究，已经有约40年历史。

为什么会选择“文革”、选择毛泽东时代作为一生主要的研究课题？宋永毅直言不讳：完全出于自己“文革”的经历，“‘文革’10年，我竟然有5年是在狱中度过。”——原来，他已经有坐牢的经验了！

“文革”爆发时，出身于“资方代理人”家庭的宋永毅，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

的初三学生，跟当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是同年级不同班的校友。

宋永毅回顾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好几点是吸引我们平民子弟的：“他提倡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当时通过中央文革提倡平等，反对‘血统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到1967年，“文革”进入“全面内战”，毛泽东自食其言，不仅不搞什么选举，实际上重新搞起“血统论”——“把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都说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是‘新血统论’。”

图书馆的大门都贴上了封条，却并不能阻挡毛头小伙子爬墙翻窗进去找书来读，反正没课，有时间读很多书。另外，伙伴中也有些干部子女，从家里拿出许多“灰皮书”“黄皮书”——也就是‘文革’前内部出版、只限那些高级干部阅读的书。宋永毅看了几十本，他记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中、下三册，描述纳粹帝国的结构、文化，希特勒怎么上台的；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写到斯大林的“大清洗”；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那些书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爱读这些书的年轻人不可能安分。上海有过两次“炮打张春桥”的运动，第一次是1967年，第二次是1968年，宋永毅卷入了，当然没有好果子吃。从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清查五·一六”，他先是被抓进“封闭式学习班”，然后是隔离审查。

宋永毅没有像当时全国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当知青上山下乡。上海是工业基地，需要劳动力，1968年夏末，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指示还没出来，他和同届毕业生就被学校分配到上海粮食局位于郊区一个储存粮食、食用油和工业用油的港口仓库工作。但1970年上海中学的“工宣队”“军宣队”，把他叫回学校关押追查。宋永毅介绍，追查“炮打张春桥”“在上海波及几十万人，迫害致死的也有几百上千，这个数字至今也还不清楚”。

#### ◇ “反革命小集团”首犯

宋永毅坐牢，更主要的是为另一件事。

参加工作以后，伙伴们仍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五个同学就两个星期左右在他家里聚会一次，交流读书心得——这就是“文革”中流行的“地下读书会”：各自去弄书，彼此交换看，再讨论切磋。这伙年轻人很自然会讲到江青30年代绯闻啦，德国纳粹帝国和当前“文革”的对比啦，甚至讲到毛泽东在指导“文革”中的失误啦等等——所有这些言论，都被归类为“防扩散言论”。

“读书会”一个在里弄小厂工作的成员，最先得隔离审查，他在“逼供信”下交待了，“还不是一般的交待，是非常夸张的交待。因为他是写小说的，所以写了500多页交待。”宋永毅笑起来，“造成我们五个人全被抓，不得了，被打成一个‘宋永毅反革命小集团’。”

他1971年12月被抓，一直没判，关在王洪文搞的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兵24小时看守，几个人挨揍挨得很厉害，绑起来打，也绝不许家人探监，只有一次，在他快要出来了之际，允许他当时在国防工委一个准部队研究所工作的大哥来看过。1976年3月，他才被放出来。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会觉得这些事简直匪夷所思。宋永毅说：“那是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隔离审查可以无限期搞下去。他们本来是想把我枪毙的，因为搞出来的‘防扩散言论’有几百条——实际上那些话我们都没有讲过，都是‘逼供信’乱弄出来的，搞得很恐怖，比如指



控我们说‘毛泽东祸国殃民，值得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当作篮球去打’——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们对毛泽东个人没什么仇恨。”

粮食局专案组把这个要犯报到上海市公安局，要正式逮捕他——竟有一百多条“防扩散言论”，这还了得？不仅可以判刑，甚至可以枪毙。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公安局已经有些“老公安”被“解放”，复查这个案子。读到如此之多的罪状，他们本能地就觉得不可能：五个年轻人，怎么会对毛泽东共产党仇恨到这个程度？

宋永毅的同学也为他抱不平，大著胆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真的得到了回音——不是毛泽东批覆的，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覆的。

宋永毅对自由亚洲电台讲过很有趣的细节：写信的同学是仔细斟酌过策略的，在信封上写下“谢静宜阿姨亲拆”——他觉得收信人一旦看到“谢静宜阿姨”的字样，会认为是少先队员写的信，产生一种惊奇感，就会拆开，而不会立即扔到一边。这个策略成功了，谢静宜确实看了，把信转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到上海市委，市委就组织了一个复查小组来复查我们这案子。这才使我有可能会在1976年初被放出来——五个中学生是说了些‘错话’，但是绝对没有这么个‘反革命小集团’”。

#### ◇ 革命导师教出一个认真的反对派

从21岁到26岁，五年监禁时光，宋永毅用来认真学习曾经狂热信仰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一允许他看的就是“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本。“我还向他们要《列宁选集》四本，他们没给我，只给我看过一本。”宋永毅还不无自豪地说：“毛泽东‘雄文四卷’我至少看了一百遍。”

一百遍！？

“我在里面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字典》和一本《政治经济学字典》，用草纸编的，现在还在家里呢。”

就是在精读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过程中，宋永毅看出了问题：“比如说，我看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本不想抗战，他只是想保存实力，将来再打内战、取得政权。”他还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悖论”……

囚禁中的读书生涯，使宋永毅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产生怀疑。也使他产生要了解“文革”的强烈愿望。

1977年考大学，他第一志愿填的是历史系，但是很遗憾，那时竟然还没给他“平反”，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他之后，又把他的档案退了回去。最后是上海师范大学急需一批两年制中学和其它成人教育的老师，上海市公安局复查他的案子的那个处长，天天去盯着说：“你们要把这个人收下来，这人很快就会平反了”，这样他才跨进了大学校门。

“文革”中他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代人思想怎么演变的？在上海中学，1968年到1970年，宋永毅就曾经主编过两本东西：《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一）和《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二）。收入了杨曦光的文章、“李一哲”的大字报、“炮打张春桥”的上海“胡守钧

小集团”的材料和那些“血统论”。

为什么要编这些东西？宋永毅说，我们这些同伴都比较有思想，觉得再过二三十年，就是我们这些人接班，那么“文革”中的思潮，对于以后的掌权绝对有影响，“太子党”有他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想法。这些“异端思潮”不管是“右”还是“左”，都应当把材料留下来。

“文革”中他虽然经历了抄家，很幸运这些材料逃过一劫。

宋永毅1980年毕业后，在上海电视大学教了一段书，又在上海作家协会搞专业研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六四”枪声一响，他马上决定离开中国——那之前他已经被美国俄亥俄大学录取，还给了他奖学金。宋永毅就把《文化大革命异端思潮集》夹在箱子里，带到了美国。他与孙大进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于1997年出版，在那本书的“后记”中，他回顾了 this 历程。

#### ◇ 从点到线再到面

宋永毅到美国本来要读历史博士，因工作难找，就改读图书馆专业的硕士。他的第一个工作是1995年匹兹堡大学给他的东亚图书馆中国文献研究员，他的“文革”研究也就是从匹兹堡大学开始。

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异端思潮”研究：从“异端思潮”开始，和他自己受迫害有关。大概从1995年开始到1997、1998年左右，“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这个概念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常识”。

第二阶段，从1997、1998年开始，一直到做第一个“文革数据库”。宋永毅说：开始注意“文革”中那些被残害、杀戮的现象，后来他编了一本书《文革大屠杀》，这本书还出了日文版、法文版。“我自己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不是从一个那时年轻人的带有派性也带有极左思潮的‘异端思潮’，而是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权灾难开始思考。”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宋永毅发现，对“文革”真相，不管是海内外学术界还是老百姓，都存在太多的误区。

比如，1998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了他和孙大进合著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目录索引》，500多页，有中文、英文、俄文、日文。这是图书馆学者从文献学角度去编的，编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至少有十几本中英文书，有几本还声称当年自己是红卫兵，说“8月18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和红卫兵在金水桥前亲切握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使宋永毅痛感到：保存历史真相一定要从原始资料著手。他搞了个大项目：华盛顿一个“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了一个115卷的《红卫兵小报》，包括2700多种红卫兵小报，就是他主编的。他们向全世界范围内征集，而他1999年回国也是为这件事，结果当局说那些红卫兵小报是“国家机密”，都给没收了。不过宋永毅强调：“我们大多数东西不是在中国大陆收集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的。例如各省市的红卫兵小报，有55卷，其中30卷是日本文革资料研究协会给我们的；第2期差不多有40卷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小报，那是加拿大一个华侨、最有名的北京小报收集专家给我们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02年到现在：从研究“文革”，走向研究整个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对当代政治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这个项目我们把它叫作‘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

宋永毅是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的专家，他介绍，自己与一般学者从资料分析出结论的研究不一样，主要成果都和图书馆信息学有关，已经有了一大批：

例如，他参加编的英文《文革大词典》，2006年出版；所有关于遇罗克《出身论》的八篇文章，关于“血统论”的原始文章，包括北大附中“红旗”，清华附中、“联动”、谭力夫的讲话等，也全部译成英文出版；另外他们还把“文革”中主要“异端思潮”、“读书运动”中的主要成果都翻成英文，分别在2001年、2004年出版……

#### ◇ 研究毛时代历史的基础建设

我最关心的是“中国当代史数据库”，请宋永毅更详细介绍。

他说，共分四个子库：

第一个，《文化大革命数据库》早已完成，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现在欧美的博士或中国大陆的博士，要写到‘文革’，很少有人不用我们的数据库！”

而且，不断发现新资料，就不断补充更新数据库，2002年出版以后，2006年更新一次，2009年更新一次，2013年又在更新。

第二个，2010年出版的《反右运动数据库》也已完成。也同样在不断补充更新，第2版又有1000万字的材料加进去。

宋永毅曾对自由亚洲电台介绍：其中比较珍贵的是“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办公厅每两个星期出一本《情况简报》，直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这是各地“反右”动态，直接影响他们决策的，总共出了69期，全部被宋永毅他们得到，“从毛泽东看那个东西，到他指示、到他决策，中央领导的决策，就有一个脉络可以看清楚”。

“反右”中各地党委还出了很多《右派言论集》，如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折射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非常宝贵的思想，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思考精华结晶，这些人当时被整得七荤八素，家人也噤若寒蝉，多半不能保存这些资料了，但被搜集到这些“罪状”中。宋永毅他们收集到近百本这种《右派言论集》。

第三个，2013年出版的《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被宋永毅认为是已经搞出的三个数据库中“最精彩的一个”。“精彩”，是说它资料的价值，是以内部档案为主的。

前两个数据库，中共内部档案不太多，像“文革”档案，是当局管得最严的，基本上还是以群众组织的公开材料为主，不过也有少量中共内部档案，例如1966年“5·16通知”以后，5月2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斗朱德的会议，有关资料就是从中共中央档案馆里“绝密”档案中搞出来的；《反右数据库》也有一些如上面所说《情况简报》那样的内部绝密档案；而《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就不同了，收入近4000份中共内部档案，都是外面看不到的，例如，四川温江地区人吃人、甘肃临夏地区人吃人的内部上报的绝密调查报告等。

2014年底，即将出版《建国初期政治运动数据库》。这样，四个数据库，涵盖了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史当然也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主要是政治运动史。那些历史的文献就全部记录在案”。

宋永毅告诉我，这个篇幅浩瀚的数据库用两种方式发行：第一种是网络发行，主要是供那些图书馆、各个学校征订，征订后整个学校全部可以用，现在全世界最主要的几十个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都订了；第二种是光盘，分门别类做好的数据库光盘，谁需要，可以到香港中文大学网站去买，可以用信用卡付款，图书馆和个人都可以买，放到自己的电脑里用。宋永毅透露，现在买的人主要是研究生和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每年办一个国际研究生班，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生一到那儿就买这些数据库光盘。

宋永毅强调：我们的数据库给学术界提供坚实的揭示历史真相的研究基础；给一般老百姓，也会精选一些，部分上网，大家可以免费用，提供的就是历史原貌——“就放在那里，我们不加任何编者按语，这是共产党一级又一级组织的调查报告：一个乡盲流出去多少人，肿病饿死多少人，被非正常打死多少人等等。中国有个传统，把历史作为镜子；我们的数据库就是提供作为一个镜子。”

#### ◇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

宋永毅在征集和整理这些资料中也在潜心思索。他认为，从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之一。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提到，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中说，整个大饥荒死的4000万人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是被活活打死的，宋永毅证实这种说法：“将来老百姓看到档案材料，就可以完全相信：那个时期的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那些酷吏、最坏的官员。他们逼要老百姓的口粮，打死多少中国农民、老百姓！农民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一打当然就死掉……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吏政，也就是官僚统治最残酷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农村。”

宋永毅看完大量原始材料，考察了人们对“大饥荒”的各种理解，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等说法，他写了一篇序，题目是“大饥荒：党国对中国农民的粮食战争”。

他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从统购统销开始的，毛泽东及其中国政府为了应付所谓“美帝国主义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建立战时经济体制，从农民口中抢夺粮食，根本和什么“天灾”啦“苏联逼债”啦，一点关系都没有！

宋永毅批驳了“毛泽东时代官员清廉”的说法，认为这主要是中共的信息封锁所造成的。从那时候苛捐杂税逼死人命、奸淫掳掠的严重状况看，农村干部的凶残超过现在，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农民是农奴，完全依附于这个国家机器、依附于人民公社。“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贪污腐败，当然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情。但是具体到农村的干部对老百姓的迫害，酷吏杀了多少人，恐怕还是大饥荒时期最严重。”

宋永毅说：毛泽东搞了一场政治的“文化大革命”，结果他把整个中国政治制度，中间还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全部给毁掉了；邓小平呢，搞了一个经济的“文化大革命”；接著就是江泽民，把老百姓中本来还有一些道德观念，又通过“金钱的文化大革命”给转换，就造成今天整个中国的道德沦丧。

他归纳：毛泽东的腐败是一小撮人腐败，邓小平的腐败是一部分人腐败，江泽民以后搞得“人人想腐败”！

◇ “我们不能等啊”

马年伊始，宋永毅与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开始了新的合作，期望他和他的伙伴们征集整理的“中国当代史数据库”中海量资料，能为更多研究者、读者知晓和善加利用。日前，作为合作的开端，33万字的《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一书，已经在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就是源自其资料库。宋永毅为这本书写了长长的序言。他与明镜的更大规模的合作，已经拉开序幕，明镜新闻出版集团也为此而着手进行结构上、技术上、人事上的准备，在不远的将来，就能推出新的成果。

我在亚洲学会2014年会上问宋永毅教授：您为什么像个永动机，一刻不停地推动一个又一个计划，完成一个又一个项目，您怎么想的？

宋永毅的回答很实在：——我们不能等啊！

他说：我们能等中共开放了档案再来从事历史研究吗？看目前中共，根本没有这个放松、放宽、放开档案史料的意图，等到猴年马月？我们必须自己干起来！

不能等，还有另一个理由，一个甚至是更重要的理由。宋永毅说，我们也到了这把年龄了，眼看毛泽东时代的亲历者、目击者，这几代人都已经、正在或者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当我们离开之后，对毛泽东时代有切身感受的人，就再也没有了！我们要赶快给未来的研究者留下东西啊！

宋永毅对毛泽东的批判锲而不舍、鞭辟入里，但这位给中国带来浩劫的领袖，至少有几句诗，让宋永毅认同：“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 摘自《新史记》19期

~~~~~

# 【史海钩沉】

## 记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 杜钧福 •

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周恩来主要向他们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干部子弟“走后门”上大学的情况，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当时听传达，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研究所里了。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对，这批人里也有不是走后门的，当然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科研骨干。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中科院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中科院，特别是在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海”了。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那时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文革中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反修防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中科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计算他们之后的日子。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作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无论是前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这些思想变化为四五运动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员仍然模糊不清。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须事事服从毛泽东的指令，甚至屈从江青的淫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在我所说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力量在左右着他们。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在文革前期，这些干部的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此时必须予以补偿。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